

总主编◎林木西

国家“211工程”重点研究项目

 国民经济系列丛书

GUOMIN JINGJIXUE XILIE CONGSHU

科学发展观与 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2006年学术年会文集

林木西 张 静 主编

KEXUEFAZHANGUAN YU
GUOMINJINGJIXUE XUEKE JIANSHE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国家“211工程”重点研究项目

国民经济学系列丛书

7123-53

2

科学发展观与国民 经济学学科建设

——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
2006年学术年会文集

林木西 张 静 主编

经济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科学发展观与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 2006 年学术年会文集 / 林木西，张静主编.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7

ISBN 978 - 7 - 5058 - 6462 - 7

I. 科... II. ①林... ②张... III. 国民经济 - 中国 - 文集 IV. F123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1132 号

总 序

即将迈入2006年之际，辽宁大学主编的“国民经济学系列丛书”推出了第一批著作，其他相关著作也将陆续出版。这是一套以中青年学者的著述为主的丛书，标志着辽宁大学国民经济学科的学术梯队日益成熟。作为一名几十年从事这一学科研究，并为之付出毕生精力和心血的老兵，回顾过去的20多年，夜以继日、孜孜以求的艰辛历程，看到今天新一代中青年优秀学者的快速成长，我心情无比激动，也无限欣慰。

1980年，出于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根据教育部门的部署，辽宁大学重建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专业。专业建立之初，只有两名教师，力量十分薄弱，与中国人民大学等名校差距十分悬殊。记得当时在全国学术界同行的一次会议上，我曾表示：一是虚心向实力强大的兄弟院校学习，诚恳地希望得到各位的帮助；二是根据改革与发展的需要，不断走创新之路。否则，我们就没有出路。1982年，我们在学习吸收当代新兴学科与 modern 管理技术的基础上，出版了全国第一本《国民经济计划方法》专著。与此同时，我们参与编写了全国第一本《国民经济管理学》。早在1983年，辽宁大学就正式开设了国民经济管理学这一新课程，成为最早开设这一新课程的学校之一。1986年，又率先在国内把国民经济计划专业改为国民经济管理专业，同时还获得了国民经济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1990年，继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之后，获得了本学科第三个博士学位授予权。1995年，与辽宁大学当时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西方经济学、企业管理三个专业一起，申请并被批准建立了辽宁大学第一个博士后流动站。2001年，辽宁大学国民经济专业又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一起，被批准为国家级重点学科。

以上是对辽宁大学国民经济专业一个台阶又一个台阶向前迈进历程的极其简要的描述。实际上，我们每前进一步，都包含着许许多多的艰

辛，包含着老师们不断拼搏、不断探索、坚持不懈的执着追求。同时，我们的进步也得益于许多学术界老前辈的指导与鼓励，得益于与兄弟院校愉快的、真诚的合作。

我们持续进行这一学科及学科群的研究，大体又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创建

应该说，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创建，是众多学者的集体成果，我们有幸成为这一集体中的一员。粉碎“四人帮”以后，学术空气日益活跃，改革意识日益强烈。1981年初，北京大学王永治老师、山东大学常健老师首先提出倡议，为适应改革需要，编写一本《国民经济管理学》，并组成了由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辽宁大学、杭州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北京钢铁学院、北京经济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等12所院校参加的编写组，在拟定编写大纲、写出初稿以后，推举苏东水、常健、王永治、孙钱常、刘海藩和我为定稿小组成员，对全书进行总纂、修改和定稿。该书于1982年出版以后，反映强烈，先后发行200多万册。该书的主要意义在于突破了传统的计划经济学的框架，形成了一个较新的体系，对宏观经济领域一些重大的新问题，如国民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国民经济战略目标体系、国民经济预测与决策、国民经济监督、国民经济管理信息系统、宏观经济效益、人力资源的开发、自然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等，较早地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与探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该书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

该书出版以后，由于主要作者工作任务有所变化，虽然通过国民经济管理学会仍组织一些学术活动，但多数作者已没有精力继续进行国民经济管理学科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辽宁大学仍坚持对这一学科的持续研究，并于1984年6月出版了《国民经济管理原因》一书，这是国内第二本国民经济管理学著作，共发行20多万册。这是辽宁大学三年来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成果。该书的主要特点：一是强调用大系统、巨系统理论分析和研究国民经济体系与国民经济管理体系；二是以较大篇幅（共3章）较系统地研究了宏观经济决策与战略问题；三是增设了一些研究宏观经济重大问题的新篇章，如经济增长率问题、国民经济结构问题、社会经济调节系统与宏观调控问题等；四是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如较早地提出了合理的适度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的质的内涵以及从量和质两个方面考察经济增长，从各个要素、各个环节的质、量、度、序的

关系去观察经济结构等观点,以及用系统理论研究社会经济调节系统、社会经济监督系统等。

二、主编国家教委统编教材,致力于学科群的建设

拓展视野,致力于本专业学科群的建设,是培养现代宏观管理人才的迫切需要,也是我们面临的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所培养的人才具有什么样的素质、能力和知识结构,关系到能否有效地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1986年,我作为国家计委干部培训教材编委会委员,接受国家计委委托,承担了《社会主义经济调节概论》一书的编写任务。为了保证质量,特邀请了宋则行、汪祥春两位老前辈担任主编,由辽宁大学、东北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共同编写。这也是国内较早的关于经济调节方面的著作。该书出版以后,又与国家计委合作,举办了全国各省市300多名从事经济调节工作的干部参加的培训班,产生了较大影响。辽宁大学已将该书作为本专业一门主干课,列入教学计划。

1988~1990年期间,我们先后接受国家教委委托,主持编写了两部统编教材,即《国民经济计划方法与模型》和《国民经济管理学教程》。前者由辽宁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南京大学协作编写,由我任主编,邵汉青、于光中、沈士成教授任副主编。该书的主要特点,除按计划工作的逻辑顺序,系统梳理了各种现代方法之外,又着重研究了综合运用各种方法编制宏观经济模型,探讨了人口、劳动、教育模型、经济增长模型、投资模型、消费模型等12种宏观经济模型的编制,虽然是初步的、粗浅的,但却是十分有益的探索。该书曾获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后者由辽宁大学、吉林大学、中央财经大学、西北大学协作编写,由我任主编,于光中、侯荣华、张其炯任副主编。该书于1990年3月出版,1993年再版,1997年第三次印刷。在此期间,经历了邓小平南巡谈话、党的“十四大”召开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我国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伟大的转折,同时也意味着为国民经济管理学这一新学科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国民经济管理学正是由于改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它也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所以,该书的编写与修订,力求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国民经济管理的要求。该书既阐述了在新的条件下国民经济管理的功能定位,也系

统探讨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国际经济往来、总量平衡等与宏观调控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形成了新的体系。特别是该书最后一篇，以更开阔的视野，首次探讨了国民经济运行如何走向良性循环、三种再生产（人口再生产、物质产品再生产、精神文化再生产）的相互促进与总体协调、生活质量与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等新问题。

在本科教学中，除上述三门专业主干课外，我们还相继开设了十多门新课，逐步建立起本专业合理的新知识群与学科群，并进行了一系列配套改革。“以学科建设为中心的配套改革”这一教学成果，1993年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三、主持编写面向 21 世纪的课程教材

20 世纪 90 年代末，国家教委高瞻远瞩，以超前意识和改革精神，提出了“高等教育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这一重大的系列化课题。辽宁大学与中央财经大学承担了“面向 21 世纪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教学改革研究”这一课题。从 1997 年 1 月开始，通过两年多的调查、思考、分析、比较与研究讨论，比较系统地研究了未来时期宏观管理人才的需求，研究了宏观管理人才应具备的知识、素质和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本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体系的设计、教材建设与学科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和相关的配套改革等问题，提出了系统化的研究报告。这一研究成果，又一次获得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

正当我们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准备编写新教材之时，适逢专业调整，教育部确定中国人民大学、辽宁大学、中南财经大学、四川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西财经大学、山西财经大学等七所院校，承担国民经济管理专业本科生的招生与人才培养任务。针对这一形势，我们考虑，应当从大局出发，发挥大家的积极性，遂倡议成立新的编委会，组织七所院校协作，共同编写了四部面向 21 世纪的课程教材，即《国民经济管理学》、《可持续发展战略学》、《宏观经济数量分析方法与模型》和《区域经济管理》。这四部教材，可以说是集体研究的成果，是合作的成果，从而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多年来我们深切体会到，学科建设不是哪一个人的事，也不是哪个学校的事，它需要学术界同仁群策群力和真诚合作，需要充分发挥群体的智慧。

四、国民经济学系列丛书的编写

当今时代，是急剧变革的时代，是科学研究日新月异的时代，经济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改革在不断深化，新知识、新技术、新思想、新事物在不断涌现，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也出现了一些本专业迫切需要研究的新问题。总之，面对时代的挑战，面对新时代对培养人才提出的新要求，我们必须不断地进行知识更新。从社会进步与科学发展的意义上说，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本没有写完的书，都有不断发展和更新的问题，更何况国民经济学还是一门年轻的学科。正是面对这一形势，辽宁大学国民经济学科现任学科带头人，勇于承担重任，提出编写一套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系列丛书的设想，并付诸实施，将陆续出版。这套丛书涉及宏观经济体制与机制、发展观念与发展模式、战略与规划、调控与监督、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分析方法等诸多领域，可谓工程浩大，任务艰巨，但这是推动本专业学科群建设的重大举措，是一件大好事。作为从事这一学科研究的一名成员，我将积极予以支持，并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这一工程添砖加瓦。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我们自身来说，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检验、一种激励、一种鞭策，同时，也是我们向学术界、实际工作部门朋友的一次学习、交流、沟通的机会，希望各界朋友不吝赐教，共同推进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

张今声

2005年10月1日

前 言

在我国应用经济学学科领域,“国民经济学”这一学科经常处于尴尬境地:在二级学科目录上,博士点和硕士点使用“国民经济学”名称,而本科专业则称之为“国民经济管理”,且全国只有七所院校设置本专业;目前国内仅有一本以《国民经济学》命名的教材,也不是由国民经済学专业人士编写的,而是由我国著名统计学家、厦门大学钱伯海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主编;当前国内学术界对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学科边界等问题其说不一,各执一端,这既反映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又从另一侧面说明了加强本学科建设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抛开对我国学科设置如何评价不说,国民经济学学科在我国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而且它不是设在“管理学”,而是设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项下。因此,单是从学科体系的连续性、一贯性的角度看,本科、硕士、博士似应沿用—个统一的名称,应该有自己的教材体系和研究体系。目前,这一问题尤显突出,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不断扩展和发展,拥有国民经済学专业硕士点、博士点和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的院校不断增加,教学和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许多院校(包括一些理工科院校)都将目光瞄准在“国民经济学”专业建设上,现在已不再是讨论国民经済学专业是否“应该”存在,而是涉及“怎样”建设和发展的问題。从这方面来看,也有一个本学科与应用经济学其他二级学科相比较而存在、相竞争而发展的问題。

作为目前国内国民经済学三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辽宁大学国民经済学专业的教学与科研人员在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带领下,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拼搏,勇于创新,在国内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和其他兄弟院校的合作下,为本学科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本学

科的发展。作为现任学科带头人，理应继续发扬老一辈经济学家的学术传统，敢于应对新世纪新的学术问题以及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的挑战，集中整个学术团队的集体智慧，为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正是出于上述考虑，由我主持编写了这套“国民经济学系列丛书”。这套丛书从构思到组织编写，都得到了辽宁大学国民经济学学科创建人、著名经济学家张今声教授的大力支持，张老师还不辞辛苦，亲自为丛书撰写总序，并主持编写了《国民经济规划学》一书，在第一批出版。

十分荣幸的是，这套丛书的出版还得到了著名中青年经济学家黄泰岩教授的鼎力支持。黄泰岩教授为全国文科首批长江学者（2004年全国高校经济学科仅有4人），现为辽宁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也是东北地区文科惟一的长江学者。他的加盟无疑使辽宁大学国民经济学专业如虎添翼。

这套丛书的作者绝大多数是辽宁大学国民经济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他们有的已经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有的正在攻读博士学位。为了增强丛书的实用性，我们还特地聘请了一些从事实际工作的发改委的专家担任编写工作。

这套丛书作为国家“211工程”重点研究项目，得到了辽宁大学“十五”“211工程”的重点资助，也是“辽宁城市经济”子项目的系列研究成果。

经济科学出版社吕萍主任为丛书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使得丛书能够较快地与广大读者见面。

对国内学术界同仁及各级领导、朋友对本丛书出版所给予的关注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中的不足之处，恳请诸位朋友不吝赐教。

林木西

2005年10月于沈阳

科学发展观赋予国民经济学 学科的历史重任（代序）

林木西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国民经济学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迅速的一门具有浓厚本土特色的应用经济学科。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民经济学学科也不断成长壮大，不仅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一批本科、硕士和博士等不同层次的应用型人才，而且在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来，中国一直实行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实施这一战略的根据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客观上存在着东、中、西三大地带，由于地理位置、劳动力素质、科技水平和经济基础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经济区域。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从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出发，首先让有条件的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起来，待东部地区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再逐步将资金、技术推进到中西部内陆地区，最终实现各个区域的共同富裕和协调发展。

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的明智选择。经过 28 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保持了令人瞩目的长期高速增长，出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但同时，收入差距加大、城乡发展失衡、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也开始凸显，形成“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局面。为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协调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十六届六中全会又进一步做出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决定。这标志着在新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开始实行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重大转折。应该说，中国发展战略的这一转折，不仅是适

应本国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也是顺应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必然选择。

缪尔达尔（Myrdal, 1957）在《经济理论和发达地区》一书中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理论，利用“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s）和“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s）概念，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头作用，又采取适当的对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区域间发展水平的差异。缪氏理论认为，区域差异不断扩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之间不断相互作用产生了不断增加的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使核心地区表现为一种上升的正反馈运动，而边缘地区则表现为下降的负反馈运动，由此产生和拉大了区域差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回波效应远远大于扩散效应，它们相互作用的结果必然导致区域差异扩大。缪氏由此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政策主张：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应当实行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投资，优先发展那些具有较强发展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也要防止累积因果循环造成地区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这时需要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区域经济政策，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缩小区域经济的差异。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 1965）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根据 24 个国家的国际横剖面数据和 10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提出一种假说，认为注重经济效益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通过“一系列的不平衡”而实现的。在经济发展初期，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将逐步扩大，但经过一段时期，地区差距将逐渐保持平稳。当经济进入成熟期以后，地区差距最终将会趋于缩小。这一理论将时间因素引入区域空间结构变动分析，注意到均衡与增长之间的替代关系随时间推移而呈非线性变化，强调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时期增长对均衡的依赖。这种运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达到平衡发展的目标，也成了区域规划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然而也有批评者指出，该理论所依据的资料和运用的概念均存在重大缺陷，而且没有普遍意义。更多的人强调，该理论主要关注结果——倒“U”的终点，而忽略了从初始到成熟的这一长时段内的发展过程，忽略了在这一过程中由于听任地区差距扩大而可能付出社会矛盾激化所带来的经济停滞的高昂代价。

归纳起来，从非均衡发展到均衡发展须经历若干阶段，主要有：

低水平均衡阶段——以经济活动孤立分散、小地域范围内的封闭式循

环为特征的空间单元的经济结构。这一阶段的经济特征往往是自然经济，以农业为主体，前后向联系少，形成低水平的均衡稳定的经济体系。

极核发展阶段——选择在地理位置优越和交通条件、经济基础好的城镇集聚经济力量，形成具有优势的区位，集中发展一些基本部门，形成区域发展的极核和极核带，吸引基本部门进行较大规模的集聚，促使较大的城镇发展为中心城市，而相对低级的城镇则变化不大，形成非均衡的城镇体系。

扩散阶段——极核带涌现出更高层次的经济活动，使原来具有的某一层次的经济活动向低级城镇扩散。由于区域经济水平的提高，较低城镇已经具备进行扩散而来的经济活动的条件，二级、三级中心城市随之发展，中心城市与低级城镇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逐渐形成城市体系。

高水平均衡阶段——区域经济更加发达，产生了新的产业部门，形成多样化、多层次的产业经济体系。同时形成各城镇的职能分工，打破单一部门结构所造成的同级城镇的经济结构相似性和非关联性，形成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联系网络，各级城镇之间的经济结构变得复杂而稳定，整个城镇体系向均衡化发展。

从上述理论发展不难看出，非均衡发展理论的主要思想是，在不平衡发展规律的作用下，由于不发达地区不具备产业或地域全面增长的资金和其他资源，因而不可能实现经济的均衡增长，因此必须进行有差别、有选择地适度倾斜发展，通过对少数发展条件较好的点、地区或地带重点开发，逐步实现由不平衡发展到相对平衡发展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非均衡发展战略本身实际上包含了均衡发展的目标导向。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发展战略的转变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掌握好非均衡发展的度。市场经济虽是效率经济，但市场机制对于社会公平目标的调节往往出现失效。市场机制固然能对区域资源的配置发挥基础性的作用，但市场机制在短期的地区利益和企业利益的牵引下，有可能加大区际差异。因此，不能完全听任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任由发展差距不断扩大，更不能消极地等待差别的自动缩小。也就是说，在坚持效率优先原则的同时，也要兼顾公平，防止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二是把握好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发展战略转变的时机。一般来说，在经济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先行发展地区由于运输成本的增加，土地、自

然资源和人的不可移动或完全不可移动,土地租金的上升,纯粹外部不经济,市场渐趋饱和,竞争异常激烈等因素的作用,必然导致集聚不经济。而将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从原来的集中地向外迁移开辟新的市场,将原增长极的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向外围扩散,可以产生较好的效果。此时,政府应顺其发展,强化扩散效应,防止因不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过大,导致原增长极的资源、要素和部分经济活动的回流。

三是抓住均衡发展的主要方面。从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看,国民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实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从长远来看,生产力的合理布局、城镇和人口在区域间的均匀分布,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有限的空间和资源,可以较好地解决环境问题,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更大发展。但是,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增长与均衡两个目标之间往往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涉及长期与短期、局部与整体、三者利益如何处理等问题。新中国虽然经过 50 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但区域之间的不平衡发展仍然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发展的目标必须从追求一部分区域不平衡发展适时转变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即把经济增长和城乡布局、区际协调、生态环境改善放在优先考虑的位置上,力争实现经济发展的生态成本和社会成本最低,资源优化配置,最终实现社会总供求在总量和结构上的基本平衡。

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给国民经济学学科提出了新问题和 tasks。今后,国民经济学应着重研究如下理论和实践问题:

第一,全面深化改革。当代中国正经历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为此必然带来经济制度的变迁。由此不仅带来了利益结构的变化,而且在利益关系变动中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和冲突。建设和谐社会必须深入研究如何继续深化体制改革,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确立体制基础。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建设和谐社会的重点之一是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如果在利益分配上真正实现了博弈基础上的公共选择,努力疏通社会弱势群体利益表达的各种渠道,就能切实保障经济发展与利益均衡。因此,国民经济学必须深入研究如何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自由裁量权”,对政府规制的范围和方式做出调整,使得政府更加廉洁和公正,从和谐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更大的执政合法性。

第三,收入和财富分配规范化。调节社会利益关系的重要原则是收入

和财富分配的规范化,反之会使那些旨在缩小分配差距的常规调节手段的作用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因此,国民经济学应该进一步研究如何使我国的财富分配规范化,创新收入调节手段,使工薪阶层平等地分享改革经济增长的成果。

第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如前所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缩小区域差别、实现区际协调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主要内容。因此,国民经济学应该认真研究如何从非均衡发展逐步过渡到均衡发展的途径和方式,克服区域经济结构的趋同性和低关联度,形成各区域明确的职能分工和不同等级城市之间的联系网络,使整个城镇体系向均衡化的方向发展。

第五,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十一五”及未来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突出的时期。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势在必行。国民经济学应该研究如何建立以循环经济为重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积极倡导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大力发展和应用相关的技术,形成资源消耗少、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高、废弃物排放少的生产和消费体系,使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能够控制在生态环境可自我更新的范围之内。

第六,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协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长期存在的一个突出矛盾是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过快,消费需求增长乏力。已有的统计分析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承受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上限是22.5%,只要不超过这一限制,中国经济对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是可以承受的;下限是4.5%,只要不低于这个数值,就不会因为固定资产投资过低而导致经济衰退。当下中国经济已经连续40多个月超过了23%。同时消费需求增长乏力,无论是从厂商存货的增加,还是消费品价格长期低迷上都表现得很突出。^①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而作为经济增长最终动力的消费拉动作用不足。因此,国民经济学应该认真研究如何调整最终产品需求中投资和消费的比例,以及如何真正启动消费需求,在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充分发挥消费需求的作用。

第七,内需与外需的协调。中国经济生活中另一个突出矛盾是在内需

^① 刘伟:《体制改革28年:中国宏观经济失衡下的多重目标抉择》,载《21世纪经济报道》2006年12月30日。

增长不足的同时，外需扩张迅猛。在国际收支领域出现大量的顺差，形成了过万亿的外汇储备。而大量的贸易顺差极易产生贸易摩擦，过多的外汇储备也容易成为通货膨胀的导火索。因此，正确处理经济增长过程中内外需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扩大内需，是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研究课题。

今年暑期，在辽宁大学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管理教育学会 2006 年学术年会上，来自全国 39 所高等院校的近百名专家和学者济济一堂，围绕着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国民经济学学科建设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与交流。为了使这次会议能够成为进一步推动学术研究的契机，更好地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建设，我们将这次会议的论文进行了精心的组织和编辑，结集出版，力争为繁荣国民经济学的学科发展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林木西

二〇〇六年十二月三日于沈阳

目 录

科学发展观赋予国民经济学学科的历史重任（代序）	林木西（1）
-------------------------------	--------

第一篇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建设

中国经济发展：阶段、问题、思路	刘 瑞（3）
“十五”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反思	金乐琴（18）
科学发展观的一种理论分析	汤吉军（26）
科学发展观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董正信（32）
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秦宪文（36）
着力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杨玉霞（43）
实现城乡经济和谐发展的对策	常春风（50）
信息租金、收入分配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曹艳秋 王建军（55）
对构建环境友好型国民经济运行机制的探讨	李惠茹（63）
论开发性金融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张 竟（70）
科学的金融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张红伟 林 景（77）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加强改进农村社会保障	杜贵阳（83）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解开的一道难题	
——资本要素参与分配中的公平正义观解析	孔陆泉（87）
我国能源消费现状与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	刘 畅（92）
知识经济时代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策略研究	牟 岩（97）